

H
O
N
G
X
U
E
B
A
I
N
I
A
N
F
E
N
G
Y
U
N
L
U

红塔

百年风云录

欧阳健 曲沐 吴国柱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红掌



百年
风云录

欧阳健 曲沐 吴国柱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 成 洪
封面设计 刘 炜
 大 鹏

红学百年风云录

欧阳健 曲沐 吴国柱 编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政编码 310006)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875 字数 499 千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 1 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900

ISBN 7-80518-276-0/I·159

定价:29.80 元

浙江古籍版图书,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序

朱一玄

近十年来,有关《红楼梦》的论争,格外引人瞩目。我曾在为《红楼》创刊十周年而作的小文中说过:“目前《红楼梦》脂评本真伪的讨论,是红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希望在已有文章的基础上,发动更广泛的讨论,并及时印出讨论专集,或由《明清小说研究》、《红楼梦学刊》出专号,使广大爱好者了解进展的情况,以便早日得出为大多数人接受的结论。也有可能长期争论下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形成学派。”我提出的由欧阳健教授提供文章编辑“《红楼梦》版本论争集”的建议,由于多种原因,未能实现;又曾与曲沐教授联系,请他归纳各家主要论点,以文摘形式结集出版,也有困难。其后,欧阳健教授即酝酿撰写《红学百年风云录》一书,此一意向受到浙江古籍出版社的重视,敦促早日成书。于是,欧阳健、曲沐、吴国柱三位先生排除冗杂,历时三年,终于完成这部大著,令人喜悦。

说起红学的“风云”,可说是与红学史相伴以行的。红学引起的诸多论争,小至家庭、友朋之间的“几挥老拳”,大至整个社会、国家的风涛席卷,层见迭出,至于一时间遍被华夏。其风或“起于青藜之末”,或“起于穷巷之间”,“溥畅而至,不择贵贱”;“动沙堞,吹死灰,骇溷浊,扬腐馀”,摧枯拉朽,绵延不断。红学之有争论,除却那沾有某种政治意味的“风云”,总是一桩好事,构成红学世界的一大景观。所以,将红学史上的论争剔理梳爬,归纳统览,写成《红学百年风云录》一书,是极有意义的,我甚表支持。

欧阳健教授我早就认识,对他的为人和治学,我一直极为赞赏。曲沐教授,八十年代于《水浒》研讨会上相识,常有书信往来,

音问不断。吴国柱先生虽未谋面,但那些出自他手笔的精彩文章,早就拜读,可谓“神交已久”。他们的为学态度和钻研精神,我是充分信任的,他们关于红学的新见,我也一向十分关心,《红学百年风云录》一书的缘起和撰写进程,我也最为清楚。去年十月,全国中青年《红楼梦》研讨会于天津召开之际,欧阳健教授前来访谈,讲起《红学百年风云录》即将竣事,嘱我命笔作序,这原是早已说好的,义不容辞。

近年来,因老年失偶,块然凄惨,弟子有来询视,相见甚慰。或问曰:“老有所乐,吾师乐乎?”答曰:“耄耋之年,自有其乐,我之乐在书中。编书著书,一乐也;观书谈书,亦一乐也;其乐无穷。”弟子欣然,曰:“苟有此乐,吾师不老矣!”今观《红学百年风云录》一书,油然生乐。吾尤喜其题目新,视角新,立意更新:一、抉取红学史上有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的论争,为审视之对象,是有史家之眼光;二、作者虽皆大论争之当事人,然行文之际,笔端无“情绪化”之偏颇,更非借端以“批判”对方,而是高屋建瓴,陈述往史,入情人理,剖分得失,是有史家之气度;三、重事实,讲道理,将观点寓于事实的缕述之中,是得史家之笔法。书中之论述,使人大有“扫荡烟埃,斥伪返本,积年堙郁,一旦霍然”之感。无论对此书之见解赞同与否,以上三条,想皆为读是书者所首肯也。

今当世纪之交,《红学百年风云录》的出版,或许正标志着对本世纪红学风云之总结,亦预示着下一个世纪红学光辉历程之将临,我祝贺它的诞生。若问有无缺陷,吾不想说些套话,性亦不善挑剔,质之高明可也。是为序。

一九九九年春日序于南开大学北村寓所,时年八十八岁

前言

欧阳健

《红楼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中国人民最为喜爱的、拥有最大读者群的古典名著。《红楼梦》问世以后，迅即受到读书界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在二十世纪的百年中，许多第一流的学者，如王国维、蔡元培、鲁迅、胡适、陈独秀、顾颉刚、俞平伯、郑振铎、阿英等，都热忱致力于《红楼梦》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在广大读者和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红学”终于成为一门举世公认的世界性的“显学”。

从红学问世的第一天起，各种论争便绵延不绝，所谓“可聚讼而如狱，可汇合而成书”，恰是这种盛况的真切写照。争论的题目，涉及《红楼梦》的基本史实（如作者与版本的考证）与《红楼梦》文本的诠释，进而触及更为深层的理论问题。红学争论的范围，从中国大陆到中国的台湾、香港，乃至扩及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人们都在关注红学，并不时掀起论争的热潮，推动着红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为了总结红学研究的经验和教训，有人写过《红学三十年》，写过《红学六十年》；当此二十世纪即将终结之际，面对完整的一个世纪，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凭借自己拥有的开阔视野的幸运，写出一部《红学一百年》，“述往事，思来者”，回顾梳理红学坎坷曲折的历史进程，以期对读者有所裨益。

本书之题名《红学百年风云录》，与一般“红学研究史”的区别是，既不平均使用力量，也不面面俱到，而是力求在“红学”与“风云”两个要点上做一些文章：

第一,所写必须是有“红学”的风云。本书采取“以史为经、以论争为纬”的结构方法,截取自《红楼梦》诞生以来、尤其是百年以来有关红学的最核心、最本质问题的重大论争,即那些确能构成为“风云”的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为主干围绕论争产生的时代背景、发展过程、所涉及的学术问题及其理论意义和社会影响,论争各方的是非得失,展开充分论述,并作出客观公正而又精到透辟的评价。红学领域不时冒出的某些并无多大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的“争论”,不在本书论述之列。

第二,所写必须是构成“风云”的红学。一个世纪以来,数以万计“红学常规研究的成果”,显示了红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其中堪称红学杰构的不在少数,它们都是红学史关注和研究的对象,然而由于未曾酿成真正意义的“风云”,所以也不在论述之列。

在各种纷争的尘埃尚未落定的时候,要来梳理红学风云的复杂进程,评断其间的是非得失,是异常困难的。有鉴于此,本书作者希望能够做到:写出时代的氛围,写出事态的实情,写出学术的真谛;在命笔之时,力求立意要高,气度要大,资料要全。

所谓立意要高,就是要避免蹈入单纯评判政治的或人事的是非功过的误区,惟以真理、学术为依归,从有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的“红学风云”着眼,独立地、清醒地对以往的红学公案进行理性的反思,并努力对未来有所展望,从而为繁荣红学事业提供有用的材料和有益的思路。

所谓气度要大,就是要时刻想到:本书作者既是这篇历史的执笔者,又是一段时期论争的当事人,这种双重的角色,决定着冲淡“情绪化”倾向的极端必要性。必须以史家的包容气度来观察、对待一切;时刻想到撰写本书不是在继续争论,更不是要借机“批判”对方,而是在客观公允地叙述以往的历史,必须入情人理地分析各自的具体情况。在不掩盖自己理论锋芒的同时,力戒作绝对性的断语。既不刻薄挖苦,亦不溢美捧场,是对本书用语的起码要求。

所谓资料要全,就是要考虑到至今尚无《红学论争集》的结集,为反映历次红学风云的本来面貌,有利于对历史进程作准确实在的把握,本书采用夹叙夹议的写作方法,将红学论争中有学术价值的材料尽可能包容其中,从资料本身的缕述中引出其固有的结论。

为了行文的省简和坚持“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依照史书的通例,本书对于所述及的红学学人,上至鲁迅、胡适,下至张训、陈玉书,不论辈份大小,地位高低,一律径称其名,如无特殊必要,亦不介绍籍贯生平,识者鉴之。

本书作者分工如下:曲沐撰写第一编《胡适红学模式确立时期的平地惊雷(20世纪20年代)》,吴国柱撰写第三编《胡适红学模式受到严峻挑战时期的惊涛骇浪(20世纪90年代)》,欧阳健撰写前言和第二编《胡适红学模式经受冲击却得到意外确认时期的疾风骤雨(20世纪50年代)》,并对全书进行统编合成。

目 录

序	朱一玄
前言	欧阳健
第一编 胡适红学模式确立时期的平地惊雷	
(20 世纪 20 年代)	1
第一章 新红学的崛起	1
一、新红学崛起的文化背景	1
二、推行“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系统工程	4
第二章 对旧红学的抨击与新红学模式的构建	16
一、胡适对旧红学的猛烈抨击	16
二、胡适所构建的新红学理论模式	23
第三章 新红学营垒内部的磨合、重构和反省	40
一、以胡适为核心的最佳组合	40
二、顾颉刚与胡适的辩难和磨合	47
三、俞平伯《红楼梦》文本解析的思维轨迹	57
四、脂本的发现和新红学的重构	76
五、俞平伯的乍然初醒和他对“自传”说的反思	84
第四章 对新红学模式的反诘与商榷	93
一、蔡元培的反驳与胡适等人的答辩	93
二、对新红学模式的商榷与诘难	108
三、胡适的红学生涯和他的红学模式的历史命运	123
第二编 胡适红学模式经受冲击却得到意外确认时	
期的疾风骤雨(20 世纪 50 年代)	128
第一章 冲击胡适红学模式的时代背景	128

一、时代迫切要求对《红楼梦》作出全新评价	129
二、“评红”新论应运而生	134
三、冲击胡适模式的疾风骤雨席卷全国	142
第二章 红学“新说”的理论武器和论证方法	153
一、《红楼梦》被定位为“现实主义”杰作	153
二、“现实主义”公式在《红楼梦》新评中的运用	161
第三章 对胡适“新红学”体系的猛烈袭击	171
一、对“新红学”的核心——“自传说”的集中批判	171
二、将“旧红学”与“新红学”重新放到历史的天平上	181
第四章 冲击胡适红学模式的战斗严重受挫	199
一、普遍存在的对于考据的扭曲心态	199
二、“冲击者”在考据问题上的客观限制	213
三、“冲击者”在“自传说”前自动缴械	226
四、“冲击者”在版本考证关前茫然无措	250
第五章 胡适红学模式得到更为巩固的确认	292
一、俞平伯对胡适模式的进一步反思和背离	292
二、历史的怪圈：胡适红学模式得到更为巩固的确认	306
第三编 胡适红学模式受到严峻挑战时期的惊涛骇浪	
(20世纪90年代)	339
第一章 新时期“惊涛骇浪”形成的前前后后	339
一、来自红学“圈外”的质疑	339
二、红学“新说”的最初反响和论辩态势的形成	344
三、从“不做反应”到“全面批驳”	356
四、'94莱阳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与“第一桩红学官司”	370
五、红学研究格局的调整和红学浪涛的渐趋平静	385
第二章 脂本程本真伪早晚之争	392
一、脂本晚出说的提出	392

二、从版本学角度论证程本为《红楼梦》真本的新尝试	403
三、对版本新说的“全面批驳”和答疑辩难	409
四、关于脂本“窜行脱文”现象的争论	440
五、关于脂本不避清代国讳争论的展开和深化	455
六、关于后四十问问题的争论	464
七、对“探佚学”的冲击	481
第三章 脂批脂斋伪托之争	490
一、脂批伪托说的提出	490
二、对脂批脂斋的全面质疑	505
三、围绕脂批真伪所展开的激烈争论	516
四、孙桐生与甲戌本关系的辨析	543
第四章 史料辨疑之争	555
一、裕瑞《枣窗闲笔》的真伪之争	555
二、宜泉《春柳堂诗稿》的真伪之争	565
三、明义《题红楼梦》的真伪之争	582
第五章 百年红学的理性反思	602
一、“还‘红学’以学”论的提出	602
二、对胡适红学体系和红学模式的历史反思	607

第一编 胡适红学模式确立时期 的平地惊雷 (20 世纪 20 年代)

第一章 新红学的崛起

一、新红学崛起的文化背景

20 世纪 20 年代初,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标志着红学终于渡过漫长的草创阶段,迈进了以胡适的名字为旗帜的“新红学”时期。胡适以新的观念、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从事《红楼梦》的研究,开创了红学事业的崭新局面,形成了全新的红学流派,启动了几乎左右整整一个世纪的学术模式。胡适对旧红学的冲击,其锋芒之所向,是身兼旧红学代表和新文化主将双重身份的蔡元培,这一事态犹如平地惊雷,必然产生惊人的社会效应,而为举世之人所瞩目。

“新红学”的崛起,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实实在在是那个新文化向旧文化发起冲击的时代的产物。1917 年 1 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励精图治,广揽人才,首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其时正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从 1916 年 3 月起就与陈独秀通信,针对当时“文学之腐败极矣”(《胡适文存》卷一《寄陈独秀》)的现状,“积思于数年而文成于半日”,于 11 月写成《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寄给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陈独秀赞之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发表于 1917 年《新青年》第 2 卷第 5 号。在此文感发下,陈独秀写了《文学革命论》与之呼应,发表于《新青年》第 2 卷第 6 号。

文章写道：“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之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胡适文存》卷一附录）可见陈、胡虽未晤面，但神交已久。至是经陈独秀推荐，蔡元培乃聘胡适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陈独秀在敦请他回国的信中说：

蔡子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按：当为北大校长），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子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归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均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特在神交颇契，故敢直率陈之。（《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胡适于1917年7月回到国内，他在50年代的《口述自传》（胡适英语口述，唐德刚翻译整理）中，回忆自己当时的感受道：“一回国我便发现文学革命的整个命题，已在广大的读者圈中明确地和盘托出。那时的读者圈不太大，但是读者们思想明白而颇富智慧。”踏上祖国大地的他，一下子发觉自己已真正置身于“文学革命”的时代氛围之中了。

8月，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教授，他是这样来描述蔡元培的：

北大校长是那位了不起的蔡元培先生。蔡校长是位翰林出身的宿儒。但是他在德国也学过一段时期的哲

学,所以也是位受过新时代训练的学者,是位极能接受新意见新思想的现代人物。他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对文学革命发生兴趣,并以他的声望来加以维护。(《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第162页)

尊崇之心,溢于言表。蔡元培也发现胡适“旧学邃密,新识深沉”,称赞他“心灵手敏”,不仅思想新颖敏锐,文章也写得精妙绝伦。于是,被誉为“本世纪十年代后期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三个巨人”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就这样适逢其会,融洽投契地相聚于北大了。在他们的共同倡导下,介绍新思想、新观念、新潮流的“新文化运动”(胡适更喜欢称“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迅即扩展开来,给北京大学带来了鲜活的勃勃生机。

1919年,北大学生组织了一个社团——新潮社,出版了《新潮》杂志,这份学生杂志英文刊名叫“Renaissance”(“文艺复兴”),就是受了胡适的影响。《新潮》以“拥护赛因斯(科学)先生”、“拥护德莫克拉西(民主)先生”为口号,宣传科学民主,提倡解放思想。1919年11月,胡适写了一篇长文《新思潮的意义》,对“新思潮”下了一个定义:“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或许可以叫做‘评判’的态度。”他认为,尼采所说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可以包括运动的真义。至于实行起来,则有三个具体方面:第一,研究当前具体和实际的问题,如以儒教为国教、改良文学、国语统一、妇女解放等;第二,“输入学理”,从海外输入新理论、新观念和新学说,为的是帮助解决今日面临的实际问题;第三,“整理国故”,对我国固有文明作系统的严肃批判和改造。胡适是这样来概括运动所要达到的目标的:

通过严肃分析我们所面临的活生生问题;通过由输入的新学理、新观念、新思想来帮助我们了解和解决这些

问题;同时通过以相同的批判的态度对我国固有文明的了解和重建,我们这一运动的结果,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文明来。(《胡适口述自传》第175页)

这些,既反映了胡适当时的精神状态,也是时代的主潮的真切写照;二者相应合拍,遂导致了古代小说研究(包括红学研究)事业的勃兴。

二、推行“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系统工程

—

胡适致力于古代白话小说的考证,是有其清醒而明确的目的的,是他为推行“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而实施的系统工程之一。在那篇经“年来再四研思”而写成的《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曾提出文学改良的“八事”,尤其强调提高“不避俗语俗字”的白话小说在文学上的地位。他说:

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荑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胡适文存》卷一,第21页)

这在当时堪称是一种大胆的反传统的观念。“在我国,小说历来是不算文学的”(鲁迅语)。儒家历来重经史而薄小说,从孔夫子开始,就称小说是“君子弗为”的“小道”。小说不能登大雅之堂,更为许多正统文人所鄙夷。在文学革命中“首举义旗”的胡适,却反其道而行之,大力推崇白话小说,将小说提高到文学正宗的地位。他不惧传统势力的反对,不管“有闻此言而却走者”的反感,再三申

说“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蚩人为文学正宗”，将《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称为“吾国第一流小说”。他还从历史进化的眼光提出：“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也”，“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模仿唐宋，亦不必模仿周秦也”。针对社会上的复古主义思潮的泛滥，他坚定地表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胡适文存》卷一《文学改良刍议》）

与陈独秀将明代“前后七子”及归有光、方苞、刘大魁、姚鼐打成“反革命文学”的“十八妖魔”、说“此十八妖魔辈，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反使盖代文豪若马东篱，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诸人姓名，几不为国人所识”，且表示“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与陈独秀的偏激态度不同，胡适似乎没有这种“矫枉必须过正”的话头；他最多是将古文之晦涩艰奥称为“死文学”，将白话文学称为“活文学”。胡适认为，中国的小说名著已经畅销了好几百年，“它们用活文字（白话）来替代文言，对近代中国文学革命运动的贡献至大，……所以我们这一文学运动事实上是负责把这一大众所酷好的小说，升高到它们在中国活文学上应有的地位”。这种见解，是非常明智的。他从“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的意念出发，认定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曲，便是真正的国语教科书。他结合自己亲身体验说：

试问，我们今日居然能拿起笔来做几篇白话文章，居然能写得出来几百个白话的字，可是从什么白话教科书上学来的吗？可不是从《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书学来的吗？……我以为我们提倡新文学的人，尽可不必问今日中国有无标准国语。我们尽可努力去做白话的文学，我们可尽量采用《水浒传》、《西

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有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它；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这样做去，决不愁语言文字不够用，也决不用愁没有标准白话。（《胡适文存》卷三《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尤其重要的是，胡适没有停留在简单宣传的水平上，他还想到了比宣传更好的方式。他在回顾自己从事研究小说的动机时说：

我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初期，便不厌其详的指出这些小说的文学价值。但是只称赞它们的优点，不但不是给予这些名著〔应得〕的光荣底唯一的方式，同时也是个没有效率的方式。〔要给予它们在中国文学上的应有的地位，〕我们还应该采取更有实效的方式。我建议我们推崇这些名著的方式，就是对它们做一种合乎科学方法的批判与研究，〔也就是寓推崇于研究之中。〕我们要对这些名著作严格的版本校勘，和批判性的历史探讨——也就是搜寻它们不同的版本，以便于校订出最好的本子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更要找出这些名著作者的历史背景和传记资料来。这种工作是给予这些小说名著现代学术荣誉的方式；认定它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胡适口述自传》第230页）

胡适和鲁迅，都是“中国小说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若就红学而言，胡适更是历史上头一个明确地同士大夫“为欺饰世俗计”而“自相矜”的“红学”划清了界限的现代型红学家。他的目标异常明晰：这就是要给予包括《红楼梦》在内的小说名著以“现代学术荣誉”，认定包括《红楼梦》在内的古代小说“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